

飞夺泸定桥: 长征中的世界军史奇迹

“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其所著《三大洲》一书中对长征如此评价。记者近日沿81年前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线路走访,对蒙哥马利这句话有了深切感受。

奇绝惊险的强渡大渡河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320里急行军,至少7次激烈的遭遇战,虽然只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小段,却生动诠释了红军的英勇善战、坚韧不拔,堪称世界军史的奇迹。

站在石棉县安顺场镇大渡河古渡口,尽管河宽只约当年一半,但河水依然激流汹涌。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馆长宋副刚告诉记者,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间正值河水暴涨的5月,早于红军72年来此的太平天国石达开10万义军就是在相同的5月、相同的地点全军覆没的。

红军何以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下成功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走进纪念馆,一段奇绝惊险的历史解开了谜底。

1935年5月,红军在机智英勇地渡过金沙江、彝海歃血结盟、佯攻大树堡吸引敌人主力后,于24日夜袭安顺场,夺得一只小船。次日上午7时,在8名船工的帮助下,红一军团一师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17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顺流向北岸挺进。船到河中央,对岸一个排的守敌集中火力向小船射击,一发炮弹打在船边,掀起惊天水柱,一梭子弹扫到了船上,一位战士手臂受伤,渡船像转盘一样猛烈旋转起来。

时任渡河指挥员的二团团长杨得志曾撰文回忆:经勇士和船工们合力撑船,渡船终于脱离了滑向礁石的险境,眼看离岸边只有5、6米了,对岸的小村子里又冲出一股敌人,企图把勇士们消灭在河滩。生死关头,“神炮手”赵章成及时开炮掩护,战士们终于跳上岸,击溃守军控制了渡口,又缴获了敌人两只船,开始人歇船不歇运送大部队。



红军22勇士飞夺泸定桥(绘画作品)

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

但仅靠缴获的三只小船渡过全部中央红军,需要一个月时间。随后赶到的毛泽东、朱德等中央军委领导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江而上夺取泸定桥,保证大军渡江。

记者告别安顺场,驱车前往泸定桥,沿途尽是高山峡谷,道路崎岖。所见几处战斗遗址告诉我们,当年红军行军途中遭受的不仅是异常疲惫和饥饿的考验,还遭遇了敌军的沿路堵

截、隔岸扫射。其中,西岸左路军至少经历了菩萨岗、猛虎岗两场战斗,东岸右路军则先后发起挖角坝、海子山和石门坎3场战斗,牵制了赶往泸定的敌军主力。

菩萨岗是一座险恶的高山,好似一堵石壁横挡在通往泸定桥的必经之路上。当年赶往泸定桥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就是在这里沿着一条如天梯般陡峭的小道攀藤附葛,迂回到敌人

阵地后面,与正面攻山的战友们合力击溃了敌人。

扫清阻敌障碍之后的四团,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为抢在敌人支援部队之前抵达泸定桥,务于29日夺取泸定桥。此时距泸定桥还有240里,来不及做饭的红军指战员匆匆吃生米、喝冷水后,即与对岸敌人展开赛跑,一昼夜疾行,终于在29日凌晨赶到泸定桥头。

创造军史奇迹

记者站在如今的泸定桥上,尽管在13根铁索外又加了9根钢索,依然左右摇晃,桥下湍流寒气逼人。

“当时泸定桥上的木板大部分已被敌人拆除,剩下光溜溜的铁索。”泸定县文广新局局长郭成燕向记者介绍,对岸川军凭险固守,我军在西岸高地迅速集中迫击炮、机关枪形成火力掩护,以二连连长廖大林、指导员王云海等22名勇士组成的夺桥突击队,腰缠手榴弹、背着大刀、手提短枪,冒死攀上横空摆荡的铁索,迎着敌人的炮火匍匐爬行,4名勇士不幸

中弹坠入江心……

勇士们没有后退,后边三连的战友也在争分夺秒抢铺桥板。终于,突击队抵近对岸,敌人使出最后一招,放火点燃了东桥头的楼亭。四团政委杨成武站在西桥头振臂高呼:“同志们、冲过去!莫怕火!敌人垮了!”勇士们一跃而起,冲进火海,不顾帽子、眉毛着火与敌展开搏斗,夺下桥头;并与后续赶来的战友一起冲到街上,与敌人激战两小时,占领了泸定城。自此,红军开启了北上抗日的新征程。

站在铁索桥上,记者见到北京游客梁女士,她感慨道:“只有身临其境才知道胜利来之不易,才能体会红军勇士们的顽强意志和战斗精神,每个人都会肃然起敬。”

“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红军不仅创造了世界军事史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奇迹,这是坚定信念支撑下精神抖擞的进军,也是激励我们今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恒久动力。”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官自德说。

据新华社

历史解码:

共产国际对长征前党和红军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阶段,在中国革命的很多关键时刻,共产国际的战略指导和无私援助,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也有过很多失误和偏差,有时还十分严重,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人选任的影响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要经过共产国际的认可和批准,有时共产国际还直接插手领导人的更替。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推举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就是受共产国际的片面影响而选出的。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错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忽视日军侵占东北后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抛弃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红军反“围剿”经验,给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投下巨大阴影,使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遥控指挥

长征前,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更多的特殊性。但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罗米那兹、米夫等人却无视这样的基本国情,作出了许多错误的指导。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王明、博古等人,盲目地顺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譬如,1934年初共产国际指出:世界革命已更加临近革命与战争时期。于是中共临时中央迅速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把“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向了顶点,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和红军处境更加艰难。

“洋顾问”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

院)学习,毕业后不久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于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苏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拱手把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李德用他有限的作战经验生搬硬套地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他反对“诱敌深入”,强力推行“积极进攻路线”;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游击战运动战,并以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原则来支持单纯防御的战术。在这种错误的军事路线指挥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终遭失败,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政治上的关门主义

关门主义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政治上的主张,而这种主张的思想和理论根源也来自共产国际。他们片面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他们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分化,主张打倒一切。正因如此,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激烈进行的时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

反蒋的福建事变。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共产党与“福建人民政府”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时隔不到20天就改变了合作方针,提出要建立下层统一战线,只要兵不要官。政策又回到原点。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共产国际。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会议指出:“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提出的蛊惑人民的诺言。”因此,博古等人把中间派看作“最危险的敌人”,不肯与十九路军进行军事上的配合,最终使中央苏区丧失了反“围剿”斗争突破困局的有利机会。

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是一个曲折艰难的历程。长征出发前,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从此中断。离开了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遵义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独立地解决了自己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和领导人问题。

凤凰涅槃,浴血重生,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

据新华社